

试论《格萨尔》史诗几种发展类型的特点

李连荣

在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格萨尔》史诗随着藏族社会跌宕起伏地发展。其众多故事情节结构之间或聚或散，经过民众审美需求的不断淘洗，逐渐形成出现了一些规律性的特点。这些较大的情节结构组织成相对稳定的一系列故事结构，我们称之为史诗的“故事类型”。依据《格萨尔》史诗的发展特点，在此笔者尝试总结出了6种类型结构。它们是：完美婚姻型（门巴型）、降魔型（安多东方型）、征服四方四国型或称四如型（安多南北型）、征服十八大宗型（康区型）、小宗与外宗型（混合型）、部本型（发展型）。以下根据每种类型的结构特点、传承区域、典型代表等方面出发，稍作简单介绍。

一、《格萨尔》史诗发展的几种类型结构

（一）完美婚姻型（门巴型）

1. 类型结构：

- （1）英雄的母亲是部落头人或其兄弟的仆人（身份低贱者）
- （2）部落头人驱逐怀孕的女仆至三岔路口（魔鬼出没地、边疆）
- （3）英雄神奇诞生（诞生前在母亲腹中说话、同时生下许多神、物品）
- （4）英雄经历磨难长大（或缺佚）
- （5）英雄经部落成员帮助与众多女子成婚

2. 传承区域：西藏南部

3. 典型代表：门巴族《格萨尔》¹

4. 特征：氏族型、天神信仰、英雄、神奇故事

（二）降魔型（安多东方型）

1. 类型结构

- （1）无子老夫妇祈子，山神光顾怀孕生下肉蛋
- （1）山神令母鹿所生之女怀孕（怀上英雄）
- （2）怀孕女经受七大魔王9年9月9天之迫害
- （3）英雄神奇诞生（肉团、自言天神投胎）

¹ 达娃讲述，刘芳贤、庞艳瑞搜集整理，李向阳翻译《“鬼人”和她的儿子》，参见《中华民族故事大系·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338-341页。

- (4) 英雄为人间父亲报仇去征服妖魔（或缺佚）
 - (5) 英雄战胜 18 妖魔从龙宫取得妻子
 - (6) 英雄征服吃小孩的妖魔并与其妖女成婚忘返故乡
 - (7) 英雄拯救被妖魔掳走的妻子
 - (8) 英雄去征服另一位妖魔（或缺佚）
2. 传承区域：甘肃、四川、尼泊尔、锡金
 3. 典型代表：白马藏族《格萨尔》¹
 4. 特征：氏族型、山神、天神信仰、英雄、神奇故事

（三）征服四方四国型或“四如型”（安多南北型）

1. 类型结构

- (1) 天神同情深陷魔鬼灾难中的人间决定派一子下凡拯救人类
 - (1)（或部落老头人帮助天神打败魔鬼祈求天神赐予一位神子）
 - (1)（或老年夫妇年老无子祈求天神赐予一位神子）
 - (2) 英雄在天界死去（选择人间父母）
 - (3) 英雄神奇诞生（老年妇女怀孕遭受迫害及驱逐、生下许多神伴）
 - (4) 英雄幼年经历各种考验（叔父迫害、脱离部落生存、取得财产）
 - (5) 英雄运用诡计成婚并显示神通成为部落（国家）之王
 - (6) 英雄独自征服西方之龙魔国（战胜吃小孩的魔鬼、拯救被抢走的妻子、忘返故乡）
 - (7) 英雄及其将领征服东方之汉地王国（或缺佚）
 - (8) 英雄及其勇士们征服北方之霍尔王国
 - (9) 英雄及其勇士征服南方之门和姜国（或缺佚）
 - (10) 英雄完成事业与其骏马、武器和妃子返回天国
2. 传承区域：青海、拉达克等地区以及土族、裕固族、蒙古族分布区
3. 典型代表：贵德分章本²、蒙古文本《南瞻部洲雄狮王传》（《岭·格斯尔》）³
4. 特征：部落（国家）型、天神（佛教）信仰、英雄史诗

¹ 马成富“从《阿尼·措》、《阿尼·格东》的源流沿革中考证《格萨尔》史诗的产生、形成年代”，岗·坚赞才让、伦珠旺姆主编《格萨尔文化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年6月，第249页。四川省格萨尔工作办公室编印《阿尼·格萨尔与冲·格萨》，2002年，第91-108页。邱雷生、蒲向明主编《陇南白马人民民俗文化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185、186-187页。

² 贵德分章本藏文原稿散佚。经笔者初步考察发现，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名为《世界大王格萨尔传》的藏文稿与贵德分章本非常相近，可以作为其原稿利用。此抄本由波塔宁于1886年左右发现于民和三川地区，笔者在此简称为“民和分章本”。

³ 此抄本事实上也属于“贵德分章本”体系。经笔者比对，它是“贵德分章本”与《安定三界》的结合本。可以说它是某个时期、某个地区《格萨尔》史诗的“完型本”。此部汉译本有青海民间文学研究会编印《南瞻部洲大雄狮王传奇》（据1959年蒙古国出版蒙古文译出），1961年5月。乌·新巴雅尔《南瞻部洲雄狮大王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

（四）征服十八大宗型（康区型）

1. 类型结构

- （1）岭国（世界）形成
- （2）因佛的劝请天神决定派一子下凡拯救深陷苦难中的人类
- （3）下凡之子的决意（四处躲藏躲避下凡、求得神龙界宝物、选择降生人家）
- （4）英雄神奇诞生
- （5）英雄幼年经历各种考验
- （6）英雄及其母亲被驱逐至玛曲鬼地
- （7）英雄通过赛马夺得部落之王位
- （8）英雄召集部落全体祭祀山神、天地决定振兴国家
- （9）英雄单骑去上方解救被魔王抢走的一位妻子
- （10）英雄及部落全体征服霍尔国解救王妃珠牡
- （11）英雄率领将领征服姜国夺回盐池
- （12）英雄及其部落征服门国（打开大米宝藏）使其国民众信仰佛教
- （13）英雄带领联军征服大食、卡且、歇日等等 18 大国取回各种宝物
- （14）英雄拯救堕入地狱的妻子和母亲
- （15）英雄完成人间事业返回天国

2. 传承区域：西藏那曲、昌都、青海玉树、四川甘孜

3. 典型代表：西藏那曲、昌都地区《格萨尔》（如白玛仁增《分大食财》、扎巴等艺人本《格萨尔》）¹

4. 特征：部落（国家）型、佛教（天神）信仰、英雄史诗

（五）小宗与外宗型（混合型）

1. 类型结构

- （1）上同 18 大宗型
- （2）穿插与其中的各种大小故事类型（如《丹玛青稞宗》、《擦瓦戎箭宗》）

2. 传承区域：西藏、青海、四川、云南

3. 典型代表：才让旺堆、昂仁等艺人本《格萨尔》²

4. 特征：国家型、佛教信仰、英雄史诗

（六）部本型（发展型）

1. 类型结构

¹ 出生于 1900-1920 年代之间的西藏那曲、昌都、青海玉树、四川甘孜等地的优秀艺人，基本上属于这一系统。2011 年随着最后一位属于这个系统的优秀《格萨尔》艺人桑珠辞世，标志着这个传承系统告一段落。那曲索县的玉梅和曲扎是他们的直接继承者，同时也是发展者。研究他们的《格萨尔》史诗，或许还可以看到这个系统的某些特点。

² 1940 年代左右出生于康区与安多地区的《格萨尔》艺人，他们在 4 魔和 18 大宗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增加了许多小宗和外宗，发展了独特的《格萨尔》史诗，形成了他们的特点。

- (1) 上同小宗与外宗型
- (2) 新创作各种大小故事
- (3) 按部本重新编目如 120 部、324 部
2. 传承区域：西藏、青海、四川、云南
3. 典型代表：格日尖参、次仁占堆、达娃扎巴等艺人本《格萨尔》¹
4. 特征：国家型、佛教信仰、英雄史诗、新创作新分类

通过上述类型化处理，目前学界所谓《格萨尔》史诗的“庞杂性”或者说不清《格萨尔》史诗到底有多少部的局面，或许从中能够看到一些眉目。类型化处理的目的在于此，更重要的是试图找到《格萨尔》是演变发展的一些规律。

另外，从上千年的传承演化中，我们仅仅抽绎出了这样 6 种类型。它们是否能够全面代表了《格萨尔》史诗发展的基本特点，或者说它们的典型性、概括性是否存在？而且我们特别强调了最近一个世纪以来《格萨尔》史诗的这种快速演变形态，并将之分为两种类型给以介绍。这也有其合理性吗？接下来我们尝试从每种类型的特点出发，说明这些类型结构的特点。

二、《格萨尔》史诗类型形成的特点

（一）关于英雄的完美婚姻

当我们关注在门巴地区传承的关于英雄的“完美”婚姻故事，很难有人想到这种普通的英雄故事，就是《格萨尔》史诗的雏形之一。

从门巴族传承的《格萨尔》英雄故事来看，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故事的结尾外——完美婚姻，还必须看到英雄神奇的出生这一点。由这两个方面，突出了英雄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英雄出生的神奇性可以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神圣性，可能将英雄与神联系在一起，继而发展出英雄是天神之子、山神之子或水神之子等进而成为人间之王的合理化解释和演绎；另一方面是高贵性，就是将英雄与王族或贵族联系在一起，继续发展下去则是进入“贵种流离谭”的哀怨的生活故事，或者成为重振朝纲的国王故事。

不论是那种发展形态，作为普通的享受艺术愉悦的民众来说，它们都将可能按照他们的“期望”发展成为英雄（国王）的史诗。《格萨尔》正式按照这样的艺术道路一路发展成了今天的模样。但是，为什么在门巴地区未能继续发展下去，而仅仅停留在了“英雄与几个女子结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出呢？这恐怕有多样的解释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在世界范围内，众多的英雄故事也是停留在了这个位置，而为进一步发展成为鸿篇巨制的英雄史诗。这就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战争主题”。没有部落之间的战争、

¹ 1970 年代左右出生于康区与安多地区的《格萨尔》艺人，他们的《格萨尔》史诗追求新部本数量，其创作技巧也正在趋于成熟。

没有部落联盟或国家之间的持续不断地冲突，英雄故事不可能发展成为英雄史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英雄的完美婚姻成为了英雄史诗的一个基础。

（二）关于降服妖魔型

一些国外史诗研究者指出，史诗中的主人公往往是氏族、部落文化的缔造者，是这个部落的文明开创者，或者说是这个部落的“祖先”¹。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看到在安多东部地区白马藏族中流传的《格萨尔》史诗，强调英雄的特立独行的品质以及他那超人的战胜邪魔的力量。我们就能够理解在英雄的“完美婚姻”之后，《格萨尔》史诗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与转变时期。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发展是《格萨尔》史诗必然、合理的结果。事实上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降魔型”史诗的某些成分要比“完美婚姻型”要早的多。或者确切一些说，降魔型是讲述祖先的史诗，而完美婚姻型则是讲述祖先之子孙的故事。但是，史诗之奇妙之处正在于将这些情节重新糅合、结构，发展出自己的风格。

（三）征服四方四国或四如型

1. 下安多型——七章本

从《格萨尔》史诗的类型来看，下安多型《格萨尔》史诗的核心地区在于贵德、化隆、民和和热贡，即从果洛、色达等地学者的视角认为的“北方地区”。这里的《格萨尔》史诗的核心故事就是“贵德分章本”²，主要艺人叫华甲（已去世）。从“贵德分章本”和华甲艺人的身份可以简括地说，此地的《格萨尔》史诗表现出了半农半牧的文化特色。

从过去学者们对于“分章本”和“分部本”的讨论来说，无疑“贵德分章本”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笔者也曾根据“贵德分章本”与“拉达克本”在情节结构上的某些共同特点，结合蒙古文本北京版《格斯尔》、土族语译本《格赛尔》，指出这些本子属于同一种“故事结构”，即所谓的“七章本”故事结构³。现在，我想通过“民和分章本”、化隆的《安定三界》以及蒙古文本《南瞻部洲雄狮王传》（也称《岭·格斯尔》），更进一步说明它们都属于下安多本型《格萨尔》史诗。

笔者曾介绍过“民和分章本”与“贵德分章本”的相同性。尽管它们之间仍然存在些微的差别，但总体上它们仍然属于同一个抄本。由于自文革中“贵德分章本”藏文原稿遗失后，研究者基本上依靠其汉译本进行比较研究⁴。但是汉译本毕竟与原稿藏文本不同，再加上翻译者和编辑者为了各自的目的进行修改，与原稿的距离就更加远了。实际上得知“民和分章本”与“贵德分章本”可能相近的事情，已经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了，

¹ 梅列金斯基著，王亚民、张淑明、刘玉琴译《英雄史诗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3页。

² 这个本子发现于1954年左右，一名叫华甲的艺人发现并借至西宁翻译发表后，在汉文化界引起重视的抄本。

³ 李连荣，《格萨尔史诗学刍论》，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29页。

⁴ 如郎樱“贵德分章本《格萨尔王传》与突厥史诗比较”，《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2期。

魔”概念。从安多型《格萨尔》的结构来看，征服“四方四魔”才是《格萨尔》史诗的核心。也可以说，在《格萨尔》发展的某个阶段，它的主要故事仅仅包括这四个内容。或者换句话说，在安多地区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这就是全部的《格萨尔》史诗。那么我们要问，在哪一段时间内“四魔”故事成为了《格萨尔》史诗的全部内容呢？很显然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牵涉到其他问题，我们在下文中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这里我们补充谈谈“四魔”的内容。笔者在讨论“七章本”结构的时候也曾谈及此概念，并且认为“七章本”可能的故事内容应该是：天界、诞生、征服汉地、北方降魔、霍尔入侵、征服霍尔、安置三界等。很显然这里已经包括了“四魔”中的“三魔”，即“汉地（或契丹）、北魔鲁赞和霍尔”。那么另外一个“魔”是哪个国家呢？我们再来看果洛本《安定三界》，很明显它将最后一个魔地指定为“姜”¹。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吐蕃时期的“四方概念”²来比对，那么最后一个“魔”应该是“天竺”或者“迦湿弥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符合“原理”的变化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且到后来《格萨尔》史诗的进一步发展或者说目前我们达成共识的“四魔”概念中，已经删除了“汉地”，取而代之的则是将“姜”和“门”，将原本连在一起的地域拆开来成为了两个国家。《格萨尔》史诗发生这种结构上的变化，究其根本来说，是社会历史背景在史诗中留下了印迹。我们在介于果洛地区（即上安多）和热贡地区（即下安多）之间的夏河县出生的艺人巴如加洛在文革时期的说唱本中，已经看到他将“汉地”替换成了“大食”³。这这似乎符合吐蕃时期的“四方概念”原理，但事实上却又丢失了另一个重要地理概念（汉地）。

《格萨尔》史诗结构中内容的变与不变，已经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过无数次了。这种变化规律，除了受到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之外，我们也可看到史诗的内部调整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就以《霍岭大战》为例来看史诗内部结构的超强的稳定发展规律和特性。

纵观整个安多型《格萨尔》史诗，我么可以说《霍岭大战》是其“核心”中的“核心”。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霍岭大战》，《格萨尔》史诗在安多地区不过是一则故事而已，根本成为不了一部结构宏伟的史诗。《霍岭大战》在《格萨尔》史诗结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我们已经在讨论“七章本型”时谈到了，特别是其中较少的英雄的数量

¹ 王沂暖、何天慧译本（第132页）和金迈、角巴东主整理本中只提到了“姜”，而在化隆本中为“姜和门”（第62页），很显然这里已经删除了“门”（第200页）。

² 麦克唐纳认为，吐蕃的“四天子概念”来源于佛教传入，她所依据的敦煌文献是《伯希和目录》第958号相关《阿毗达磨》的经文：无热恼池四周有四条河，东河流向汉地，南河流向印度，西河流向冲木格萨尔，北河流向突厥和大食。以及《汉藏史集》：吐蕃在中央，汉地和契丹在东方，南部是印度和迦湿弥罗，西部是大食，北部是冲木格萨尔。（“四天子理论”在吐蕃的传播，《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89、91页）

³ བ་ཅ་རྒྱལ་སློན་ནས་བཤད་པ།ཚུལ་ཁྲིམས་ཀྱིས་བཟུ་ལྷོན་དང་ལེགས་སྒྲིག་བྱས། སྤྱིར་མཚོག་ནོར་བུ་དང་འདུལ་གྱི་རྣམ་ཐར་ལྟུང་ལྟ་མཚོ་ལས་མཛད་པ་ལ་མའི་ལལ་གདམས་བཞུགས་སོ།།ཀར་ལུང་མི་རིགས་དཔེ་སྟེན་ཁང་།༡༩༧༤ལོའི་ཟླ༩འོག་ཟངས་ཀྱང་།

和“全部战亡”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个抄本的“早期性”和“完整性”。不过，在这里我所要强调的是另一点，正是昂仁《霍岭大战》中的“玛曲”（黄河）成为了安多型史诗的支柱。玛曲的这边是岭国，玛曲的那边是霍尔国，玛曲的渡口、玛曲上部的十三峰、下部九峰、玛域达塘、玛康岭等等，这些勾勒出了史诗“真实的历史”，我们“岭国祖先的历史”。因此，《格萨尔》史诗就是“我们祖先之歌”。

（四）完型结构十八大宗

总体上来看康区《格萨尔》史诗的类型，可以简括地总结为两类，即以昌都为中心的下康区型——“七大宗型”和以那曲为中心的上康区型——“十八大宗型”。当然自18至19世纪以来，以德格为中心的“抄本系统”，则更加推进了《格萨尔》史诗的进一步系统化发展。而从艺人角度来讲玉树为中心的康区北部艺人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类型。

1. 下康区型——七大宗型

关于下康区型《格萨尔》的概念，主要源自佐哲·白玛仁增编辑本《分大食财》。根据曼秀·仁青道吉的考察，佐哲·白玛仁增生活于1625~1697年间¹。这位著名的大圆满派上师还是两座佐庆寺的创建者。关于《分大食财》的编辑出版时间，曼秀·仁青道吉考订为1661年²。根据其传记，佐哲·白玛仁增出生于昌都的类乌齐，从小就在昌都寺生活学习。29岁（1653年）师从伏藏师都堆多吉学习，后去波密修行，证得正果，获得“康区大圆满修行者”称号。之后于1663年前往拉萨、桑耶寺等地布施、修行，拜见过五世达赖喇嘛等³。由此可见，1661年首先在江达县的波罗寺刊刻《分大食财》是完全可能的。之后这个本子曾在拉萨、安多等地也刊刻发行⁴。从上述事实可知，这是我们所见最早的印刷本，比起1725年左右出现的蒙古文北京木刻本《格斯尔传》要早半个多世纪。

我们已经讨论过蒙古文北京木刻本《格斯尔传》属于“七章本型”《格萨尔》史诗。也就是说，从总体上来说它也是“降伏四魔型”史诗。《分大食财》部也属于“降伏四魔型”。但是这里的四魔已经非常明确地变成了现今流行的说法，即：北方魔国、霍尔国、姜国和门国。这与“七章本型”和“降伏四魔型”有一些差别，即其中的“汉地（契丹）”已经被取代了。《分大食财》的主要内容讲的就是征服大食国以后，格萨尔大王主持下向“四方四国”及岭国各部进行分赏的故事。除了明确地提出了已经成为岭国属国的四方四国外，本部的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提出了新的概念：七大宗。

¹ 曼秀·仁青道吉“远古的《格萨尔》——试论《格萨尔》的原始‘素材’”，《西藏研究》2007年第4期。

² ལྷན་ཤུལ་རིན་ཆེན་རྫོགས་བརྒྱུ་ལེན་པའི་མཛུགས་ཀྱི་སྐོར་ལྟོ་བོད་རིག་པ་དཔེ་སྟུན་ལང་། ༡༩༡༡ ལོའི་ཟླ་༩་པོ་ཤོག་གྲངས་ ༢༢༡ པ། ལྷན་ཤུལ་རིན་ཆེན་རྫོགས་བརྒྱུ་ལེན་པའི་མཛུགས་ཀྱི་སྐོར་ལྟོ་བོད་རིག་པ་དཔེ་སྟུན་ལང་། ༡༩༡༡ ལོའི་ཟླ་༩་པོ་ཤོག་གྲངས་ ༥༧༩ པ།

³ ལྷན་ཤུལ་རིན་ཆེན་རྫོགས་བརྒྱུ་ལེན་པའི་མཛུགས་ཀྱི་སྐོར་ལྟོ་བོད་རིག་པ་དཔེ་སྟུན་ལང་། ༡༩༡༠-༡༩༡༡ ལོའི་ཟླ་ ༡༠ པོ་ཤོག་གྲངས་ ༢༠༠༠ ལང་། ༢༠༡༡ པ། 堪珠·贡觉丹增著、克珠群佩译《宁玛派源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347-348页。

⁴ 据笔者目前所见，约有3种刻本：（1）波罗寺刻本，（2）拉萨木如寺刻本，（3）安多刻本。三种刻本各有语言和文字上的差异，具有各自特点；但总体上三者实属同一个故事。“安多刻本”不知刻于何地，判断为安多本的原因主要依据安多口语风格。2002年笔者就曾在拉萨八廓街购买到木如寺的刻本。

七大宗包括：大食、索波（粟特）、阿扎、歇日、朱孤（突厥）、米怒、甲那（汉地）、尼泊尔、天竺¹。事实上本部着力宣扬的是“七大宗”概念，但作者列出了上述九大宗的名称以及相对应的“财宝”名称，这与目前流传的部名分毫不差。因此，笔者认为根据整理者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或者说就当时传承在下康区昌都为中心的《格萨尔》史诗属于“七大宗型”。而且从已经征服的“四方四国”和“大食”以及即将要去征服的其他八大宗来看，这些部名在当地的艺人中也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不论是作者推崇的“七大宗型”也好，还是我们总结出的“九大宗型”也好，都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格萨尔》史诗的繁荣局面。

事实上在作者推崇“七大宗”概念的同时，他还列出了他认为的许多小宗的名称，如擦瓦戎、鲁赤、噶德、卡切、甲毛戎、索齐格、木雅、丹玛、象雄、泊惹、阿赛等²。这些所谓的“小宗”在当时在下康区范围内也应该得到了广泛的传承，而且这也很自然地进入了上康区型“十八大宗”《格萨尔》史诗概念系统。

这一点可从后来的昌都地区艺人的说唱得到证实。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时昌都最有名的艺人学图·旺波·波拉诺布占堆（约1930年代左右去世），曾演唱过《姜岭大战》、《门岭大战》、《大食财宗》、《索波马宗》、《白热绵羊宗》、《阿扎玛瑙宗》、《祝古兵器宗》、《阿色铠甲宗》、《歇日珊瑚宗》等9部，但从其在甘孜的弟子登巴江才提供的目录以及他对老师的称赞来看³，恐怕学图·旺波所知《格萨尔》已经超出了“七大宗”的系统，而跨入了“十八大宗”的系统。这一点也可以从当代发现、出生于昌都边坝的著名的艺人扎巴所唱目录得到证实⁴。

2. 上康区型——十八大宗型

20世纪80年代，当你见到一位来自那曲地区的杰出艺人，问他会多少部《格萨尔》史诗时，他的回答自然是：“会唱全部十八大宗。”很显然，这里的“十八大宗”指的并不是只有18部故事，而正如我们在上文中见到的下康区地区的“七大宗”的概念是一样的，它只不过是艺人或者当地区人对《格萨尔》史诗的分类系统。因此，当真正询问艺人十八大宗的名称时，可能每位艺人均有自己的“十八大宗”名称⁵。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艺人说不全“十八大宗”名称，也不能因为他每天说的“十八大宗”的名称不一致，更不能因为他说的部名远远超出了“十八大宗”而感到不可思议。总之，这种现象表明了一段时间内，《格萨尔》史诗呈现出的最大形态。也可以说至今

¹ ལྷག་གཟིག་ཚོར་འབྲེད་འོ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ལྷན་ཁང་། 1980་དང་། 2002་ལོའི་ལྷག་གཟིག་གྲངས་ཡུལ་བཟོ། 王沂暖、何天慧译《分大食牛·安定三界之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8页。吴均译《分大食牛之部》（资料之一——西康包鲁寺刻本），青海民研会编印，1960年5月，第7页，另在40-41页中叙述了九大国：除以上七大国以外增加了尼泊尔和天竺两国。

² ལྷག་གཟིག་ཚོར་འབྲེད་འོད་ལྗང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ལྷན་ཁང་། 1980་དང་། 2002་ལོའི་ལྷག་གཟིག་གྲངས་ཡུལ་བཟོ།

³ 徐国琼《〈格萨尔〉考察纪实》，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73页。

⁴ 据徐国琼介绍，扎巴也曾想去拜见学图旺波学习《格萨尔》（同上171页）；扎巴虽然有40多部，但基本上属于“十八大宗型”范畴。

⁵ 杨恩洪《民间诗神》，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李彬《那曲〈格萨尔〉艺人介绍》（打印稿）等均可见到详细介绍。

为止，它依然代表着《格萨尔》史诗的全部内容。

（五）新时期的发展

自 20 世纪以来出现的不论是“小宗和外宗型”，还是“部本型”，都是晚近表现突出的《格萨尔》史诗类型。它们的具体表现正是在“十八大宗型”的基础上，企图尝试创新的一种表现。尤其是后者，更多地受到了上个世纪 80 年代政府部门和学者的引导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形态。

如果我们说扎巴这一批艺人依然在捍卫“十八大宗型”这种完型结构的话，那么昂仁这些生于上世纪 40 年代的艺人们则试图在跳出“十八大宗型”的限制。尤其他们通过强调自己的“小宗和外宗”，来区别于上一代艺人并实现自己的价值。格日尖参等更年轻的艺人，则追求着自己所能说唱《格萨尔》史诗的总部数，尽管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创作尚未完全走出“十八大宗型”结构。

三、小结

首先，我们从上述类型结构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特征——《格萨尔》史诗巨大的扩容性特点。它从单篇英雄故事开始，经过小型史诗（史诗雏形）的发展，最终形成大型史诗。这其中突出表现了《格萨尔》史诗长时段发展过程中时代性特征。不同的时代史诗强调了不同的主题：或者是婚姻、或者是战争、或者是财富、或者是和平精神、或者是宗教情怀等等。正是这样复杂的主题混合在一起，史诗今天所表现出的时代特征就越发显得模糊迷离。

从以上类型结构，可以看到《格萨尔》史诗的形成和发展“地望”就在安多、康区地区。这种鲜明特征映照的并不是说，《格萨尔》史诗是安多和康区的，之所以在这些地区能够表现为一种显性文化，是因为边疆战争所馈赠给这些地区的一种礼物而已。而事实上更确切些说，《格萨尔》史诗是以卫藏文化为基础，创造出来的伟大的藏族史诗。但史诗并没有在卫藏地区“兴盛”的原因，不外乎在于作为正统文化的宗教和体制文化在这些地区的强势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的牵制，这就使得它在这些地区处于一种“隐形文化”、“潜文化”或者成为了流于道听途说的“巷谈论资”。而事实上我们从整个藏族历史和现状来看，《格萨尔》史诗一直在不断广泛吸收各种文化的基础上又广泛普照于整个藏族地区。

李连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